



亞洲電視數碼媒體啓播典禮前晚於大埔總台舉行，嘉賓雲集、星光熠熠。曾經門庭冷落車馬稀的廠房，再度變得車水馬龍。新台徽、新楹聯、新宣傳，一派全新氣象。

經歷了喪失免費電視牌照之痛的亞視，在幾度風傳「死而復生」之後，終於正式宣告復活。

對於筆者而言，過往親歷的亞視風霜歲月，亦伴隨着亞視復活而記憶復甦。再回首，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

猶記得，亞視閉台前夕，久不看電視的筆者，好似出席送行儀式一般，正襟危坐電視機前，戀戀不捨地將每一個畫面印入腦海，直至廣播信號戛然而止。

曾經慨嘆，作為全球首家華語電視台的亞洲電視，竟然以在愚人節失去免費電視牌照的停播方式，黯然退出歷史舞台，難免無限唏噓。只因爲，亞視之於筆者，不僅是職業生涯的重要一頁，更是童年時期的文化啓

蒙、青少年時期的歲月典藏。

幼年時，對港台文化的懵懂認知，始於亞視。彼時，中華大地正煥發着春回大地的欣榮生機。作爲港台進入內地第一劇，《大俠霍元甲》之於國門甫開的國人，好似荒漠中的一股清冽甘泉，滋潤心田。在娛樂生活匱乏的年代，一部黑白電視機，意味着十分難得的精神享受，忠實的觀眾恨不能與電視談一場地久天長的戀愛，每晚急不可待地赴一場劇集的約會。每當《萬里長城永不倒》的雄渾旋律響起，一家老小團團圍坐在小小的黑白電視機前，目不轉睛地追看劇情，播完再意猶未盡地議論一番。「萬人空巷」恐怕只能形容其盛大表象，卻無法描摹觀眾激動澎湃的內心世界。拒做東亞病夫的愛國主線，萬里長城永不倒的象徵意蘊，纏繞着俠骨柔情的刻骨愛戀，貫穿着精彩絕倫的武俠情節，夾雜着香港明星的光環效應，每每扣人心弦，在改革開放之初，無異振聾發聵，

激發國人對發達影視文化的渴望，引發國人當自強的強烈共鳴！

從此，一發不可收拾地迷戀上港台文化。從《秦始皇》、《武則天》、《少女慈禧》、《陳真》、《馬永貞》、《精武門》、《中華英雄》，到《八仙過海》、《萍蹤俠影錄》、《再向虎山行》、《勝者爲王》、《戲王之王》、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、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》、《縱橫四海》，總是令人如醉如痴，欲罷不能。亞視劇集早已化作青蔥歲月的光影記憶，成爲幾代人永不褪色的集體回憶。

入職之初，適逢亞視五十五周年。有幸參與編撰《香港光影錄》，追憶亞視的光輝歲月，方知亞視在劇集之外，曾有諸多新猷與光環：從開創清談節目《龍門陣》，到首創資訊娛樂節目《今日睇真D》；從成人清談節目《今夜不設防》橫空出世，到綜藝節目《百萬富翁》異軍突起；從新聞節目《時

事追擊》揚威國際，到大型紀錄片《尋找他鄉的故事》享譽香江……交織成臨危不亂、百折不撓、自強不息的悲壯亞視。

在亞視的三年又五個月，人生第一次遭遇辦公室政治的荼毒，同時又感受到無處不在的濃郁人情味。風雨飄搖中，親歷亞洲會

的誕生與成長，執筆備受爭議的電視評論節目「ATV焦點」，踏足公司秘書等工作領域，跌跌撞撞地完成文字工作者向行政管理者的轉變。

從續牌一役到欠薪風波，驚濤駭浪中，亞視人憑赤子之心無懼風雨，一路前行，心路隨局勢變化而跌宕起伏。縱使離開，卻依然牽掛，只因人生的際遇已然令彼此成爲命運的共同體，水乳交融。亞視終究是亞視人的亞視，必將成爲記憶中永不磨滅的寶貴印記。

亞視復活之際，不禁生發一番感慨，期待着新亞視有朝一日鳳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！

心交流，不避避掩掩。另有個特別優點，他們舉杯時不「先乾爲敬」，要問「我們乾了，好嗎」，你若說不要，人家就尊重你。

美國人的不可愛之處也不少。濫用槍械，縱容持槍者；無形的種族歧視；流行吃速食；「美國優先」讓全世界生厭；到哪裏都遠，要開車；愛幼，卻不如我們「尊老」；我行我素，在特朗普時代變本加厲；治安的好壞分區域，好的區域路不拾遺，差的地方常有搶劫，如果有人在某地出事，警員好奇你「爲什麼來這兒」，言下之意是那裏不安全。

還有一些現象，則與可愛不可愛無關。好比說亞洲人流行群體文化，言行舉止要被群體認可，否則就有壓力，但是老美不管；一些我們認爲是關心體貼的話，房子多大、開什麼車、賺多少錢、是否結婚，他們卻認爲是隱私。美國人的可愛與不可愛，平時我們都不在意，細想起來還真是如此。

有個現象我不理解，少數中國人一到美國就變，變得守規矩，擔心犯了法不能脫罪。另一現象我能理解，那邊的中文受台灣人影響，在美國呆久了口音要變，變得帶閩南腔。

口音變了有煩惱，回國時不理解的朋友還以爲你「假」，是「洋涇浜」。

中國有值得美國人學習的方面。第一該學的，是很少發生槍擊案，這一點他們真該好好學一學，雖然學起來有難度。

人的思維慣性，容易以己之長量他人之短。欣賞他人之美，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，曾提出文明共融的「美美四句」，即「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與共，天下大同」。中國人、美國人，該彼此欣賞和學習對方的優點。如此這般，國家才會更加強大，個人才會不斷進步。

去年，王鼎鈞先生的新書《靈感》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。這位九旬散文家說，靈感的可愛在於「靈光閃過，靈思湧現，晨露初滴，新桐乍引」，「熱愛寫作的朋友無需覺得靈感神秘，無需慨嘆靈感難得，同類生同類，讀這本書，可以從別人的靈感中來，到自己的靈感中去。」

筆者讀其書，真有「從其靈感中來至己靈感中去」之感，並因此聯想到柴可夫斯基關於靈感的論述。這位俄羅斯作曲家喜歡法國詩人繆塞的《四夜組詩》，其中一首《靈感》寫出了靈感的神秘性，他曾反覆誦讀：「爲什麼我的心跳得這樣快？是什麼東西在我身體裏遊蕩？使我平白地感到驚慌？是誰來了？誰在喊我？——沒有人。我子然一身，只聽得時鐘在響。」

但是後來，根據自己的音樂創作經驗，他覺得靈感不像繆塞形容的那樣神秘飄渺，而認識到靈感更是勤奮工作的產物。他寫道：「靈感不是一位隨叫隨到的訪客。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工作，一個真正的誠實的藝術家不能藉口興致不佳而袖手閒坐。如果有人等着好情緒，而不去半路上迎接靈感，就很容易墮入懶怠和冷漠。他應該相信，當他克服了自己的壞情緒，靈感就必然會來臨。」

柴可夫斯基認爲，人的惰性很強，藝術家的責任是永不屈從於懶惰。他常給自己嚴格規定每天的作息時間，如有一年，他固定的工作時間是從上午十點工作到中午一點，再從下午五點工作到晚上八點。他說：「每天在固定的時間裏，從腦子裏擠音樂，這不是容易的。」不過，他還是樂此不疲，安坐冷板椅，從腦子裏「擠」出一部部交響曲、協奏曲、歌劇、芭蕾舞劇，一生的作品全集多達六十三卷。

他十分欽慕格林卡的才華，可又深爲這位「俄羅斯音樂之父」惋惜，甚至「懊喪得要痛哭」，因爲格林卡的一生僅僅顯示了他能做什麼，而沒有做到他能做的十二分之一。他出生於貴族家庭，柴可夫斯基說他「用貴族的態度」從事音樂創作，有興致時玩票

似地寫一點，更多時候是恬淡賦閒，什麼也不寫。

柴可夫斯基讚賞的是「鞋匠的態度」。他在一八九〇年給詩人羅曼諾夫的信中寫道：「莫扎特、貝多芬、舒伯特、門德爾松、舒曼創作他們不朽的作品時，就像鞋匠做靴子一樣，每天都工作；多半都是如此，因爲他們常有訂約，結果便有傑作產生。倘若格林卡是個鞋匠，不是貴族，他將寫出十五部歌劇，而不是兩部（的確，這兩部是出色的），還會加上十部奇妙的交響曲。」他多次感嘆：「格林卡寫得太少了！」

柴可夫斯基自己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「鞋匠」，一個勤勤不息、孜孜不倦的「做靴子的工匠」。他說，他的工作制度是「純粹手工業式的」，也即「絕對正規化的」，按時按點，按部就班，「沒有半點馬虎」。當然，這並不意味他否定靈感的作用，相反，他認爲靈感有兩種，「一種自然的來自內心，另一種來自訂約。」他說，藝術家過着雙重生活：一般人的生活和藝術家的生活，而這兩種生活不總是同時並存；在有人請他寫作並規定期限的情況下，他一般也都能激發起自己的情感，在不特別快樂的時候可以

滿懷歡快的創作情緒，在愉悅的環境裏也可以寫出充滿憂傷情緒的作品。

寫於一八八〇年的慶典序曲《1812年》便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靈感的產物，而是應約爲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落成典禮而作，這座教堂毀於一八一二年拿破侖侵略戰爭的戰火之中。他起初沒有把握，不知能否寫好，結果卻譜出了一部深受大眾歡迎的佳作，在戶外演出時曲中的炮火聲使用真的大炮，更顯示它是一曲氣壯山河的凱歌。高爾基稱讚這部序曲是「深具人民性的音樂」，「表現了莊嚴的歷史時刻，極其成功地描繪了人民奮起保衛祖國的雄偉氣魄」。顯然，《1812年》既是柴可夫斯基這個「鞋匠」的受約應景之作，又是這位藝術家「自然的來自內心」的靈感之作。

柴可夫斯基後來又一次談到「工匠」與「靈感」的關係：「根據經驗我知道，如果一個人實在不願意工作，他就永遠做不成什麼事情。任何藝術家、作家、音樂家，其實也就是一個工匠。難道淺嘗輒止、意志薄弱和懶惰懈怠，就能等到靈感來臨？假如你懶懶散散，便休想得到靈感。」

## 各美其美 美美與共



看娛樂節目常有這種情況，一個老外在台上說脫口秀，台下的觀眾笑得前仰後合，我們卻如空中浮雲，茫然不知笑點何在。這是文化差異，咫尺與天涯，距離是很大的。中國人和美國人，隔着偌大的太平洋，思維方式不盡相同。

好比說旅遊，兩國的遊客各有各的期待。美國人期待與自己環境不一樣的東西，原始的、聖潔的、聞所未聞的，愈原始愈要去。甚至有極左的美國人說，發展不一定是好事，現代化帶給人類的是災難。這個說法就離中國人所想差遠了。中國人想的是，怎樣才能又快又好地趕上去，從前叫「只爭朝夕」，現在叫「撻起袖子加油幹」。

中國遊客期待的事物要分階段。二三十年前出國，一下飛機就忙着看招工資訊；之後期待看高樓大廈，紐約的時報廣場、香港的銅鑼灣、東京的銀座；這一二十年，中國現代化步伐加速，高樓大廈興起，養眼的事物數不勝數，他們興趣轉移，也愛看民俗的、稀奇的、標新立異的了。好比說土耳其的咖啡文化、法國的紅酒作坊、美國的印第安部落……當然，有些人還期待看房子。無論是看民俗看稀奇還是看房子，都是經濟實力的體現。

客觀地說，美國人有很多可愛之處和不可愛之處。可愛之處猶如：愛向陌生人打招呼，彼此友好，有時好到令人感動；重視家庭關係，多數人守本分，下班就回家，周末打理花花草草，做運動，看電影，郊遊，去教會等；遇事冷靜，危險時刻把安全留給弱者；年輕人自強，創造未來不依賴父輩；不畏老，退休了也不閒着，猶如「春蠶到死絲方盡」；有問題誠

心交流，不避避掩掩。另有個特別優點，他們舉杯時不「先乾爲敬」，要問「我們乾了，好嗎」，你若說不要，人家就尊重你。

美國人的不可愛之處也不少。濫用槍械，縱容持槍者；無形的種族歧視；流行吃速食；「美國優先」讓全世界生厭；到哪裏都遠，要開車；愛幼，卻不如我們「尊老」；我行我素，在特朗普時代變本加厲；治安的好壞分區域，好的區域路不拾遺，差的地方常有搶劫，如果有人在某地出事，警員好奇你「爲什麼來這兒」，言下之意是那裏不安全。

還有一些現象，則與可愛不可愛無關。好比說亞洲人流行群體文化，言行舉止要被群體認可，否則就有壓力，但是老美不管；一些我們認爲是關心體貼的話，房子多大、開什麼車、賺多少錢、是否結婚，他們卻認爲是隱私。美國人的可愛與不可愛，平時我們都不在意，細想起來還真是如此。

有個現象我不理解，少數中國人一到美國就變，變得守規矩，擔心犯了法不能脫罪。另一現象我能理解，那邊的中文受台灣人影響，在美國呆久了口音要變，變得帶閩南腔。

口音變了有煩惱，回國時不理解的朋友還以爲你「假」，是「洋涇浜」。

中國有值得美國人學習的方面。第一該學的，是很少發生槍擊案，這一點他們真該好好學一學，雖然學起來有難度。

人的思維慣性，容易以己之長量他人之短。欣賞他人之美，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，曾提出文明共融的「美美四句」，即「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與共，天下大同」。中國人、美國人，該彼此欣賞和學習對方的優點。如此這般，國家才會更加強大，個人才會不斷進步。

去年，王鼎鈞先生的新書《靈感》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。這位九旬散文家說，靈感的可愛在於「靈光閃過，靈思湧現，晨露初滴，新桐乍引」，「熱愛寫作的朋友無需覺得靈感神秘，無需慨嘆靈感難得，同類生同類，讀這本書，可以從別人的靈感中來，到自己的靈感中去。」

筆者讀其書，真有「從其靈感中來至己靈感中去」之感，並因此聯想到柴可夫斯基關於靈感的論述。這位俄羅斯作曲家喜歡法國詩人繆塞的《四夜組詩》，其中一首《靈感》寫出了靈感的神秘性，他曾反覆誦讀：「爲什麼我的心跳得這樣快？是什麼東西在我身體裏遊蕩？使我平白地感到驚慌？是誰來了？誰在喊我？——沒有人。我子然一身，只聽得時鐘在響。」

但是後來，根據自己的音樂創作經驗，他覺得靈感不像繆塞形容的那樣神秘飄渺，而認識到靈感更是勤奮工作的產物。他寫道：「靈感不是一位隨叫隨到的訪客。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工作，一個真正的誠實的藝術家不能藉口興致不佳而袖手閒坐。如果有人等着好情緒，而不去半路上迎接靈感，就很容易墮入懶怠和冷漠。他應該相信，當他克服了自己的壞情緒，靈感就必然會來臨。」

柴可夫斯基認爲，人的惰性很強，藝術家的責任是永不屈從於懶惰。他常給自己嚴格規定每天的作息時間，如有一年，他固定的工作時間是從上午十點工作到中午一點，再從下午五點工作到晚上八點。他說：「每天在固定的時間裏，從腦子裏擠音樂，這不是容易的。」不過，他還是樂此不疲，安坐冷板椅，從腦子裏「擠」出一部部交響曲、協奏曲、歌劇、芭蕾舞劇，一生的作品全集多達六十三卷。

他十分欽慕格林卡的才華，可又深爲這位「俄羅斯音樂之父」惋惜，甚至「懊喪得要痛哭」，因爲格林卡的一生僅僅顯示了他能做什麼，而沒有做到他能做的十二分之一。他出生於貴族家庭，柴可夫斯基說他「用貴族的態度」從事音樂創作，有興致時玩票

似地寫一點，更多時候是恬淡賦閒，什麼也不寫。

柴可夫斯基讚賞的是「鞋匠的態度」。他在一八九〇年給詩人羅曼諾夫的信中寫道：「莫扎特、貝多芬、舒伯特、門德爾松、舒曼創作他們不朽的作品時，就像鞋匠做靴子一樣，每天都工作；多半都是如此，因爲他們常有訂約，結果便有傑作產生。倘若格林卡是個鞋匠，不是貴族，他將寫出十五部歌劇，而不是兩部（的確，這兩部是出色的），還會加上十部奇妙的交響曲。」他多次感嘆：「格林卡寫得太少了！」

柴可夫斯基自己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「鞋匠」，一個勤勤不息、孜孜不倦的「做靴子的工匠」。他說，他的工作制度是「純粹手工業式的」，也即「絕對正規化的」，按時按點，按部就班，「沒有半點馬虎」。當然，這並不意味他否定靈感的作用，相反，他認爲靈感有兩種，「一種自然的來自內心，另一種來自訂約。」他說，藝術家過着雙重生活：一般人的生活和藝術家的生活，而這兩種生活不總是同時並存；在有人請他寫作並規定期限的情況下，他一般也都能激發起自己的情感，在不特別快樂的時候可以

滿懷歡快的創作情緒，在愉悅的環境裏也可以寫出充滿憂傷情緒的作品。

寫於一八八〇年的慶典序曲《1812年》便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靈感的產物，而是應約爲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落成典禮而作，這座教堂毀於一八一二年拿破侖侵略戰爭的戰火之中。他起初沒有把握，不知能否寫好，結果卻譜出了一部深受大眾歡迎的佳作，在戶外演出時曲中的炮火聲使用真的大炮，更顯示它是一曲氣壯山河的凱歌。高爾基稱讚這部序曲是「深具人民性的音樂」，「表現了莊嚴的歷史時刻，極其成功地描繪了人民奮起保衛祖國的雄偉氣魄」。顯然，《1812年》既是柴可夫斯基這個「鞋匠」的受約應景之作，又是這位藝術家「自然的來自內心」的靈感之作。

柴可夫斯基後來又一次談到「工匠」與「靈感」的關係：「根據經驗我知道，如果一個人實在不願意工作，他就永遠做不成什麼事情。任何藝術家、作家、音樂家，其實也就是一個工匠。難道淺嘗輒止、意志薄弱和懶惰懈怠，就能等到靈感來臨？假如你懶懶散散，便休想得到靈感。」

去年，王鼎鈞先生的新書《靈感》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。這位九旬散文家說，靈感的可愛在於「靈光閃過，靈思湧現，晨露初滴，新桐乍引」，「熱愛寫作的朋友無需覺得靈感神秘，無需慨嘆靈感難得，同類生同類，讀這本書，可以從別人的靈感中來，到自己的靈感中去。」

筆者讀其書，真有「從其靈感中來至己靈感中去」之感，並因此聯想到柴可夫斯基關於靈感的論述。這位俄羅斯作曲家喜歡法國詩人繆塞的《四夜組詩》，其中一首《靈感》寫出了靈感的神秘性，他曾反覆誦讀：「爲什麼我的心跳得這樣快？是什麼東西在我身體裏遊蕩？使我平白地感到驚慌？是誰來了？誰在喊我？——沒有人。我子然一身，只聽得時鐘在響。」

但是後來，根據自己的音樂創作經驗，他覺得靈感不像繆塞形容的那樣神秘飄渺，而認識到靈感更是勤奮工作的產物。他寫道：「靈感不是一位隨叫隨到的訪客。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工作，一個真正的誠實的藝術家不能藉口興致不佳而袖手閒坐。如果有人等着好情緒，而不去半路上迎接靈感，就很容易墮入懶怠和冷漠。他應該相信，當他克服了自己的壞情緒，靈感就必然會來臨。」

柴可夫斯基認爲，人的惰性很強，藝術家的責任是永不屈從於懶惰。他常給自己嚴格規定每天的作息時間，如有一年，他固定的工作時間是從上午十點工作到中午一點，再從下午五點工作到晚上八點。他說：「每天在固定的時間裏，從腦子裏擠音樂，這不是容易的。」不過，他還是樂此不疲，安坐冷板椅，從腦子裏「擠」出一部部交響曲、協奏曲、歌劇、芭蕾舞劇，一生的作品全集多達六十三卷。

他十分欽慕格林卡的才華，可又深爲這位「俄羅斯音樂之父」惋惜，甚至「懊喪得要痛哭」，因爲格林卡的一生僅僅顯示了他能做什麼，而沒有做到他能做的十二分之一。他出生於貴族家庭，柴可夫斯基說他「用貴族的態度」從事音樂創作，有興致時玩票

似地寫一點，更多時候是恬淡賦閒，什麼也不寫。

柴可夫斯基讚賞的是「鞋匠的態度」。他在一八九〇年給詩人羅曼諾夫的信中寫道：「莫扎特、貝多芬、舒伯特、門德爾松、舒曼創作他們不朽的作品時，就像鞋匠做靴子一樣，每天都工作；多半都是如此，因爲他們常有訂約，結果便有傑作產生。倘若格林卡是個鞋匠，不是貴族，他將寫出十五部歌劇，而不是兩部（的確，這兩部是出色的），還會加上十部奇妙的交響曲。」他多次感嘆：「格林卡寫得太少了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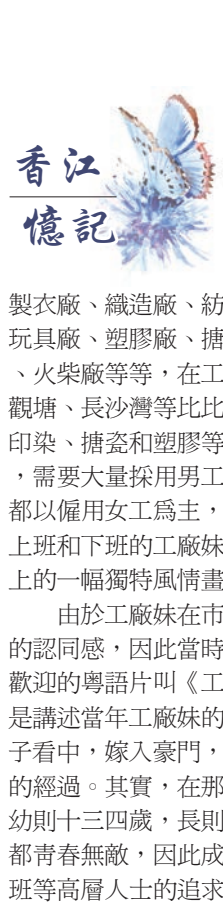
柴可夫斯基自己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「鞋匠」，一個勤勤不息、孜孜不倦的「做靴子的工匠」。他說，他的工作制度是「純粹手工業式的」，也即「絕對正規化的」，按時按點，按部就班，「沒有半點馬虎」。當然，這並不意味他否定靈感的作用，相反，他認爲靈感有兩種，「一種自然的來自內心，另一種來自訂約。」他說，藝術家過着雙重生活：一般人的生活和藝術家的生活，而這兩種生活不總是同時並存；在有人請他寫作並規定期限的情況下，他一般也都能激發起自己的情感，在不特別快樂的時候可以

滿懷歡快的創作情緒，在愉悅的環境裏也可以寫出充滿憂傷情緒的作品。

寫於一八八〇年的慶典序曲《1812年》便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靈感的產物，而是應約爲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落成典禮而作，這座教堂毀於一八一二年拿破侖侵略戰爭的戰火之中。他起初沒有把握，不知能否寫好，結果卻譜出了一部深受大眾歡迎的佳作，在戶外演出時曲中的炮火聲使用真的大炮，更顯示它是一曲氣壯山河的凱歌。高爾基稱讚這部序曲是「深具人民性的音樂」，「表現了莊嚴的歷史時刻，極其成功地描繪了人民奮起保衛祖國的雄偉氣魄」。顯然，《1812年》既是柴可夫斯基這個「鞋匠」的受約應景之作，又是這位藝術家「自然的來自內心」的靈感之作。

柴可夫斯基後來又一次談到「工匠」與「靈感」的關係：「根據經驗我知道，如果一個人實在不願意工作，他就永遠做不成什麼事情。任何藝術家、作家、音樂家，其實也就是一個工匠。難道淺嘗輒止、意志薄弱和懶惰懈怠，就能等到靈感來臨？假如你懶懶散散，便休想得到靈感。」

## 工廠妹生涯

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香港的手工作業非常蓬勃，什麼原子粒收音機廠、假髮廠、製衣廠、織造廠、紡織廠、印染廠、玩具廠、塑膠廠、搪瓷廠、熱水瓶廠、火柴廠等等，在工廠區如新蒲崗、觀塘、長沙灣等比比皆是，當中除了印染、搪瓷和塑膠等行業因工序繁重，需要大量採用男工之外，其餘工業都以僱用女工爲主，於是，成群結隊上班和下班工廠妹就成爲當年社會上的一幅獨特風情畫。

由於工廠妹在市民心目中有強烈的認同感，因此當時就有一齣相當受歡迎的粵語片叫《工廠皇后》，內容是講述當年工廠妹的辛酸和如何被太子看中，嫁入豪門，一朝成爲老闆娘的經過。其實，在那個年代的打工妹幼則十三四歲，長則十八九歲，全部都青春無敵，因此成爲工廠少爺、領班等高層人士的追求對象，但並非每

個工廠女工都嚮往這種生活，加上一間工廠的女工往往過百人，被看中的實在寥寥可數，於是便成爲電影公司的拍攝題材。

真正的工廠妹，作風都相當樸素和儉樸，她們很多都會在上班前自行做飯，然後攜飯壺上班，以節省在外用膳的開支，而在下班後，又會結伴到夜校增長知識，遇上假期，如果不用看管弟妹和做家務的話，一班工友會相約到郊外遊玩或看電影，生活雖然簡樸，但卻自得其樂。

由於五六十年代香港經濟環境仍然欠佳，因此女孩子都趨向早婚，在嫁人後很多都會成爲家庭主婦，生活重擔就落在丈夫身上，加上當年的節育意識薄弱，婚後幾年就兒女成群，丈夫一旦發生工業意外或生病，舉家就手停口停，那種困難處境不足爲外人道，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，很多家庭悲劇就因此而生。當然，絕大多數的家庭都能夠頂住困難，成就今天的幸福，大家應該好好珍惜啊！

雨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下，早晨撩開窗簾，滿眼是雨滴。好雨！我連聲讚道。

好雨知時節，該來才來。三藩市灣區，從十二月起算是雨季，但到了新年一月上旬，才真正正經地地下起來。不是豪雨，太大的雨挾帶風暴，摧毀電線杆和大樹，路被掩，屋頂被掀，河水暴漲，人間狼狽不堪；好雨也不是敷衍地皮的毛毛雨，不算吝嗇，卻弄不濕傘下的夾克，至多讓鞋子的邊沿洩一層濕潤，如國畫上出岫的遠雲。

我打開一把摺疊傘，出門去。明明知道簡陋的傘對不起好雨也將就。寫雨，似乎繞不開傘。油紙傘配江南雨巷，紫布傘配旗袍麗人。我不寫傘，不是因爲手中所持，並非名滿天下的「福屯」牌透明烏龍傘，而是因爲好雨不需要耳朵來肯定。儘管雨敲打張力十足的傘面，是造得出類似芭蕉的效果。

過分熟悉的環境，讓雨水洗滌得再水靈，也難得有「眼睛一亮」的驚喜。而況，午間的寂寥怎麼也打不破。剛才我駕車去換引擎油，偌大的連鎖店沒有客人，一群工人在閒聊。街上的行人，走路沒有聲音。大小汽車經過，濺

起不多的水花。這氛圍純然屬於雨——淒清，孤獨，雋永。

我約了友人X去吃午飯。友人沒到，該是被雨耽擱了。我路過約好見面的餐館，從落地窗望進去，只有一個侍應生。我在門外徘徊，給休士頓的朋友打電話。這裏的雨對那裏的雪。談了二十分鐘，該談的都談了。

友人X沒露面。給他家的座機打電話，只有答錄機回答，可見他在外面。然而他是朋友中唯一沒手機的「雅人」。只好獨自落座，進餐。餐廳隨後進來兩撥客人，都低聲點菜，靜悄悄地動筷子。不知道爲何雨天裏，人爲何都不意氣飛揚？

走出餐館，雨勢依舊。打開雨傘，才發現柄端的把手丟了。剛才打電話時，一小伙子從面前走過，向我出示一個塑膠小方塊，問：「是不是你的？」我想不出它是什麼，搖搖頭。原來是從傘端掉下的。爲此笑自己的愚魯。

但沒有遺憾，只想爲好雨造一個譬喻。忽然想起一位鄉親，她是單身母親，兩個星期前從家鄉來三藩市看望寶貝兒子。兒子十七歲，上本市最好的高中，品行和學業都教長輩驕傲。鄉親後天就要回國，說好今晚來我家吃晚飯。但她改變主意，理由是：兒子患了感冒，要

在家陪。

我靈機一動，好雨不就是「感冒」嗎？感冒於青年人，效果一如初戀，發燒似欲有介事的浪漫情節，大汗淋漓，轟轟烈烈又不失安全。而母親終於有了最好的理由，最得宜的方式，釋放積存已久的母愛。平日，以「我是大人」自命的兒子對老媽的柔情多少有所抗拒，這一刻，卻只能乖乖地變回襁褓的嬰兒。母親替他量體溫，侍候喝水，服藥，揩汗，換衣服。兒子可以撒嬌，可以誇張地哼哼唧唧；母親忙裏忙外，沒有憂慮，只有欣慰。這樣的小病如可求，一年來一兩次是不錯的。

友人X終於沒來，也許他住的北岸區，雨勢比我在的灣濱更大，而廉價摺疊傘中途壞了，他逃進在下城一家書店，起先爲了避雨，稍後卻迷上新上架的書籍或光碟；也許雨水沖壞了馬路，巴士停駛……更浪漫的設想，是他在雨裏走着走着，靈感驟至，得絕句一首，爲了推敲，而在空寂的公園徘徊，世間一切渾然忘記。若然，梧桐樹會提前爆出蔥綠的芽梢來回應。

好雨必須綿長。直到下午，雨沒放停。我坐在書桌前，呷自泡的咖啡，看窗外雨滴與欄欄的桃樹。廣闊的寧靜，向電腦，向遠方敞開。

雨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下，早晨撩開窗簾，滿眼是雨滴。好雨！我連聲讚道。

好雨知時節，該來才來。三藩市灣區，從十二月起算是雨季，但到了新年一月上旬，才真正正經地地下起來。不是豪雨，太大的雨挾帶風暴，摧毀電線杆和大樹，路被掩，屋頂被掀，河水暴漲，人間狼狽不堪；好雨也不是敷衍地皮的毛毛雨，不算吝嗇，卻弄不濕傘下的夾克，至多讓鞋子的邊沿洩一層濕潤，如國畫上出岫的遠雲。

我打開一把摺疊傘，出門去。明明知道簡陋的傘對不起好雨也將就。寫雨，似乎繞不開傘。油紙傘配江南雨巷，紫布傘配旗袍麗人。我不寫傘，不是因爲手中所持，並非名滿天下的「福屯」牌透明烏龍傘，而是因爲好雨不需要耳朵來肯定。儘管雨敲打張力十足的傘面，是造得出類似芭蕉的效果。

過分熟悉的環境，讓雨水洗滌得再水靈，也難得有「眼睛一亮」的驚喜。而況，午間的寂寥怎麼也打不破。剛才我駕車去換引擎油，偌大的連鎖店沒有客人，一群工人在閒聊。街上的行人，走路沒有聲音。大小汽車經過，濺

起不多的水花。這氛圍純然屬於雨——淒清，孤獨，雋永。

我約了友人X去吃午飯。友人沒到，該是被雨耽擱了。我路過約好見面的餐館，從落地窗望進去，只有一個侍應生。我在門外徘徊，給休士頓的朋友打電話。這裏的雨對那裏的雪。談了二十分鐘，該談的都談了。

友人X沒露面。給他家的座機打電話，只有答錄機回答，可見他在外面。然而他是朋友中唯一沒手機的「雅人」。只好獨自落座，進餐。餐廳隨後進來兩撥客人，都低聲點菜，靜悄悄地動筷子。不知道爲何雨天裏，人爲何都不意氣飛揚？

走出餐館，雨勢依舊。打開雨傘，才發現柄端的把手丟了。剛才打電話時，一小伙子從面前走過，向我出示一個塑膠小方塊，問：「是不是你的？」我想不出它是什麼，搖搖頭。原來是從傘端掉下的。爲此笑自己的愚魯。

但沒有遺憾，只想爲好雨造一個譬喻。忽然想起一位鄉親，她是單身母親，兩個星期前從家鄉來三藩市看望寶貝兒子。兒子十七歲，上本市最好的高中，品行和學業都教長輩驕傲。鄉親後天就要回國，說好今晚來我家吃晚飯。但她改變主意，理由是：兒子患了感冒，要

在家陪。

我靈機一動，好雨不就是「感冒」嗎？感冒於青年人，效果一如初戀，發燒似欲有介事的浪漫情節，大汗淋漓，轟轟烈烈又不失安全。而母親終於有了最好的理由，最得宜的方式，釋放積存已久的母愛。平日，以「我是大人」自命的兒子對老媽的柔情多少有所抗拒，這一刻，卻只能乖乖地變回襁褓的嬰兒。母親替他量體溫，侍候喝水，服藥，揩汗，換衣服。兒子可以撒嬌，可以誇張地哼哼唧唧；母親忙裏忙外，沒有憂慮，只有欣慰。這樣的小病如可求，一年來一兩次是不錯的。

友人X終於沒來，也許他住的北岸區，雨勢比我在的灣濱更大，而廉價摺疊傘中途壞了，他逃進在下城一家書店，起先爲了避雨，稍後卻迷上新上架的書籍或光碟；也許雨水沖壞了馬路，巴士停駛……更浪漫的設想，是他在雨裏走着走着，靈感驟至，得絕句一首，爲了推敲，而在空寂的公園徘徊，世間一切渾然忘記。若然，梧桐樹會提前爆出蔥綠的芽梢來回應。

好雨必須綿長。直到下午，雨沒放停。我坐在書桌前，呷自泡的咖啡，看窗外雨滴與欄欄的桃樹。廣闊的寧靜，向電腦，向遠方敞開。

